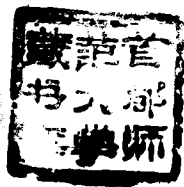


审视中学语文教育

孔庆东 摩罗 余英时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551992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世纪末的尴尬/孔庆东等著
—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4
“草原部落”黑马文丛·贺雄飞主编
ISBN 7—81036—343—3/Z·40

I. 审…

II. 孔…

III. 审视—中学语文教育

IV. 24

审视中学语文教育

责任编辑:黄洁玲

出版发行: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印 刷:北京华文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4.5625

字 数:350 千

版 次:199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1036—343—3/Z·40

定 价:22.80 元

毛主席语录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选自《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本书编委会

学术顾问：严家炎 钱理群 王富仁 蓝棣之
童庆炳 王晓明 夏中义 黎 鸣
王得后 郑 敏 朱学勤

总 策 划：贺雄飞

主 编：孔庆东 摩 罗 余 杰

编者的话：拯救语文

这是一本批判的书，但批判的对象不是老师，批判的方式不是谩骂。

这是一本控诉的书，但控诉的被告不是作家，控诉的结果不是宰杀。

这是一本伤心的书，因为再不伤心我们的孩子将不会说话。

这是一本拯救的书，因为再不拯救，我们的民族将由聋而哑。

悲惨的中学生朋友，我的弟弟妹妹，你们学了12年语文，居然写不好一张字条；你们学过数百篇的课文，居然听不懂一首歌谣；你们呕心沥血背诵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写作特点”、“标准答案”，只不过是应付几个小时的高考。假如你考上了中文系，大学老师第一天就会告诉你：“把你从前所学的，全部扔掉！”

可怜的中学语文老师，我从前的同事，我永远的同胞，你们也明知这样的教材不对，这样的教法不好，可是为了让学生考上大学，为了让家长露出微笑，为了能当上“优秀教师”，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指导”……你们只好牙掉了咽下肚硬把老鼠讲成猫。你们在教研室也是愤愤不平，对“标准答

案”热讽冷嘲，可是一走进教室，你们就黑手高悬黑教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对待学生的质疑和不满，你们失去了“人民教师”应有的气度和耐心，你们表现得比山大王还蛮横，比希特勒还粗暴。咱们是不是需要想一想：自己的饭碗和祖国的花朵，究竟哪一个更重要？

陈旧的内容，极左的观念，荒谬的肢解，专制的答案，处处和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不协调，处处和科教兴国的总目标唱反调。辛辛苦苦的老师，他们已经丧失了独立讲解一篇文章的能力，每周到区里统一备课，就像文革时的早请示，晚汇报；凄凄惨惨的学生，被强迫着弄虚作假，穿靴戴帽，硬说朱自清写《荷塘月色》是因为“四·一二”大屠杀，硬说周朴园的性格是虚伪冷酷残暴；写作文必须“开门见山”，结尾一定要联系四化，形势一片大好。我小的时候拒绝写“批邓”文章，老师还夸我能够独立思考。今天学生写《我的1998》，忘了提“抗洪”二字，便被老师斥责为“傻冒”。

语文课应该给学生情感美的滋养，应该给学生艺术美的熏陶。可是今天的语文课成了艺术的屠宰场，成了情感的死囚牢。少数有个性有才华的学生，受压抑受苦闷，少数有锋芒有见解的老师，招嫉恨招烦恼。语文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我们立国立人的依靠。从远古的圣贤，到我们共和国的三代领导，都把语文问题看得十分重要。幸好，举国上下已经意识到当今语文的积弊，四面八方飞来燕山雪片般的声讨。这些声音难免有一点夸张和激愤，那是因为他们要拯救的，是世上最沉重最豪华的“泰坦尼克号”。拯救语文，就是拯救中华文明，就是拯救炎黄子孙圣洁的心灵和智慧的大脑。让我们的弟弟妹妹们，儿女侄孙们，绕过冰山和暗礁，在通畅无边的艺术公海上，自由地选择最适合他们性情的航道。

语文教育的弊端及其 背后的教育理念（代序）

——访钱理群教授

是培养人还是培养工具

摩罗：最近两年社会上对中学语文的关注与批评越来越多，不少报刊都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章，有的出版社还出版了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著作。因为对中学语文教材及其教学方法的批评，必须以特定的教育理念作为支持。把中学语文作为一个突破口，由此深入下去，全面地考察和检讨中国教育的方方面面，也许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钱理群：教育方面的问题太值得关注了，也太值得批评了。我觉得 1949 年以来许多大的失误是比较好容易弥补的，但有两个大的失误是很难解决的。一个大的失误就是人口问题，这使我们现在面对如此众多的人口毫无办法；其次就是教育问题，而最近这 20 年来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问题，教育方向所造成的恶果短期内是看不出来的。教育的问题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也可以分为“软件”和“硬件”两方面。我们的教育失误主要表现在软件上，

而软件上的失误更是一时看不出来的。越是一时看不出来，积累下来的问题就会越多，隐藏着的恶果也就必定越大。开句玩笑说，毛泽东将是为中国历史留下最大问题的人，我的意思是指他在教育问题上的失误。

摩罗：我们姑且说是失误吧。半个世纪以来，这种失误所造成的恶果实在太大了。比如在课程设置上，几十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取消哲学课了。在人类的教育体系中，哲学本来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它是引导人们怎样认识世界、认识人类，怎样跟人类有史以来的文化精神文化财富沟通的知识。可是长期以来我们竟然没有哲学课，从小学到大学，一直用“马列”这么一个具体的学派代替哲学。实际上马列也给我们阉割成了纯粹的意识形态话语，而不是什么哲学。站在讲台上讲马列的，可能一千个中也找不到一个是研究马列的学者。他们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还相距遥远，跟作为人类文化精神的最高体现的哲学这门学科就更是遥不可及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没有哲学课，这对我们每个人的精神生活，对这个民族的文化想象力和文化发展，都有致命的影响。一个民族怎么能这么久没有哲学？一个民族的教育怎么能这么久没有哲学课呢？我记得在俄罗斯帝国最严峻的时期，即尼古拉一世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曾经由一个将军来主管教育，停止哲学课达 25 年，但在 25 年之后还是恢复了。可我们失去哲学课已经有半个世纪了，到哪一天才能恢复，目前还是一个遥遥无期的事。

我对这个民族的精神状态的评价是非常低调的，我对自己精神状态的评价尤其低调。我们都感到自己的精神资源严重匮乏，有些东西我们觉得是十分宝贵的文化财富，却没法转化为我们的精神资源。我们没有一种基本的价值作为枢纽将它转化过来。我们精神上的这种荒芜状态，当然跟半个世纪以来的严酷历史有

关，但其中有一个紧密相关的因素就是我们的教育中长期没有哲学课。我们因此对世界缺乏基本的认识，完全被一种自我封闭的意识形态训练所窒息。一旦政治及其相关的意识形态出现某种松动，我们立时就会失去信念，感到动摇和空虚。我们没有别的东西来填补这种空虚，即使企图去找点什么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因为我们没有哲学，没有对外部世界和人类文化的基本认识和理解。如果切断了了一个民族与哲学的联系，也就是切断了这个民族与整个世界的精神联系。这样的民族多半是要堕入灾难的深渊的。

对于这种危险的精神境遇，我们很难说已经有清楚的认识，但至少有一些隐隐约约的感觉。要想对这一现象进行根本的反思，目前在精神上、学术上、政治上都难以做到。中学语文好像可以说是许多矛盾的交汇点，所以才有许多人将目光投到这上面来。可是，在目前过于功利过于意识形态化的教育理念的限制之下，我们对中学语文的讨论能够深入下去吗？

钱理群：教育上的问题分为两层，一是制度的问题，二是教育理念问题，制度问题在目前显然还没法深入谈下去，这涉及一个靠谁办教育的问题，如北大曾经展开论战，讨论是书记重要还是教授重要。蔡元培的“教授治校”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但至少比现在这种方式要好一些。

摩罗：比完全的政府办学要好，我们现在的学校基本上都是政府机关，大学尤其如此。

钱理群：现在是党委领导一切，教育本身体制化以后，教授与体制也会产生一种新的关系。

在大学里面，培养目标应该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培养要求；一个是作为专门知识分子的培养要求。现代知识分子应有三大基础知识：第一是哲学，第二是数学，第三是

语言，包括中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看一个时期最热烈的学科是什么，一定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某种特点。“五四”时期提出哲学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哲学应是解决对世界的根本性看法的，某种程度上也是解决人的信仰、信念、终极目标和终极关怀的问题。蔡元培就是坚持这种教育思想的。蔡元培在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热衷于对中国传统教育进行改革。在全国第一次教育讨论会上，蔡元培明确提出新的教育方针，提出“五育并举”的思想：一是军国民主义教育，大概指今天所说的体育；二是智力教育；三是道德教育。他认为这三者属于教育现象学的问题，明确提出这三者是服从于政治的，或用今天的话说是服从于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与此同时，必须还有一个超越性的、关于彼岸世界的教育，为此他提出了世界观教育。他认为这有两层意义：一是消极意义上如何看待物质世界，他告诉学生不要拒绝，不要逃避，也不要执迷于此；二是积极意义上要追求对人格的培养，对彼岸世界的关怀，培养学生超越政治和科学的东西，培养起宗教层面的东西。但他对宗教的作用有所保留，认为宗教容易形成独尊，这与自由理念抵触，因此提倡美育，认为美育是从现实世界向彼岸世界过渡的东西。美育既有普通性又有超越性，因而美育可代替宗教。他提出的前三个教育目标，在有关会议上很快就得到认可，并被会议所通过。第四个关于世界观的教育没有人赞成，它跟德国教育有关，别人根本不懂，自然就否定掉了。第五个目标即“美育”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开始是完全被否定掉了，后来有人提出不把美育作为全国教育的方针，而把它作为中小学教育的方针。再后来，美育被人们缩小成我们今天所讲的音乐、美术。我们今天的教育，实际上是“半截子教育”。蔡元培认为“五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此间既强调了长远的根本性培养，又考虑了现实性需要。因为教育在现实的层面还有建

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这一思想跟鲁迅的“立人”思想相衔接。一方面要建立民族国家，要求每个公民“德智体”发展，另一方面要“立人”，立具有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的人。“德智体”是下半截，世界观是上半截。两相衔接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教育。而我们目前的教育处于被拦腰斩断的状态，上半截的教育被斩下来丢掉了。这世界观的教育从蔡元培提出一直延续到现在都没有得到落实，它一直遭到怀疑和否定。今天更加变本加厉，以前强调政治功利目的，现在加上商业功利目的，这双重的功利性把教育压得残缺不全。

当前研究起来比较复杂的是毛泽东教育思想。毛泽东明确提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转变人的思想，马列课最初的目的也是世界观教育。毛泽东在人们心中是圣人形象。他把伟人分为贤人和圣人。贤人具有具体事功意味，比如秦皇汉武之类。他在《沁园春·雪》词中列举了他们这一类人在事功意义上的成功，并提出要超越这种事功的贤人，要求自己做一个“圣人”。他认为圣人是要影响和改造人的灵魂的，因此他的目标不仅是改造物质世界，更要改造人，要向人性挑战。他在这方面遭到了失败。他把全国变成一所大学校，以转变人的思想为根本，而不局限于“德智体”的那一套。他要改造人的灵魂，这本身就带有专制性。蔡元培提出的要开发人本身所具有的美好的东西，这不是要外加一个什么东西，而是要把一个人内在美好的本质激发出来使它升华、丰富，跟这个世界建立一种更加广泛的联系。人一出生时什么也不懂，意识也很弱，在他们长大的过程中，已经长大的人应该帮助这些没有长大的人跟世界建立广泛的精神联系，将他们内在的美好东西激发出来。人的灵魂美好是生而有的。一个好的导师最大的本事是能把一个学生本身潜在的创造想象力诱发出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教育与被教育者相互诱发创造想象力，最后

是双方都得到升华，我认为这就是比较理想的教育的状态。马列主义是诸多学说中的一种，如果在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中，将某一种学说、思想置于独尊的地位，这就落入了蔡元培所极力避免的宗教迷雾之中。洗脑筋和世界观教育是两回事。毛泽东要把学生的思想纳入他所需要的所谓“愚封灭资”的洗脑中去。这实际上是一种更为可怕的心理专政。你很难说 1949 年后不重视思想教育，但这种思想教育与启蒙意义上的世界观教育几乎是背道而驰的。它的结果就是导致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断裂和精神窒息。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失败了，但在另一个意义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摩罗：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是应该把教育理解为一个国家和政府的行政行为，任由其从国家权力和利益出发训练合格的公民，还是应该把教育理解为人类群体对每个个体所施行的文化行为，要求它从人本身出发，在尊重基本人性的前提下，帮助每个个人认识宇宙是怎样的，地球是怎样的，人类文化和人类经验是怎样的，从而使每个个人尽可能成为拥有最丰富的文化资源、最广阔的精神自由的人。我们生活在大自然中，应当跟大自然建立一种认识上的、情感上的联系与交流。我们与每个个人之间、与整个人类之间，也应该建立起这样的联系与交流。我们一成年，我们脑子里就拥有人类的整个一部历史，这个历史激励我们追求我们更加美好的人生，追求更加丰富的精神生活。教育的过程就是把人类的一切经验和文化都教给学生，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功能。这样，学生就可以拥有人类所有的精神资源。在拥有了这样丰富的精神空间之后，一个人才可能按照自己的愿望有选择地设计自我，同时按照自己的愿望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一个人在精神上的最高尊严就是独立地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也就是说，给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是自己的事，而不应是由

所谓“教育”规定了一个统一的意义来强加给所有的人。我觉得怎样活才有意义，就选择怎样的活法，只要这种活法不侵害别人，就应当得到尊重。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高权力就是给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的权利。帮助每一个人最切实最完整地实现这样的权利，这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当然教育还有为一个社会所需要的特定内容，包括作为政权而存在的国家对教育提出的某一部分合理要求，也应受到适当的尊重。比如在目前的人类游戏规则中，要激发公民有足够的爱国心来捍卫自己国家的主权，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只是教育目的中的一小部分，而且次要的一小部分。可是我们的教育目前的基本状态跟我所理解的教育目的是相反的，它尽可能地切断学生跟人类文化和大自然的联系。它只告诉学生在人类所有的思想财富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是好的，其他一切都是坏的，都是对人类精神有损害的。这样一来，我们实际上就切断了学生同人类文化的联系。文革时在这方面走到了极点。文革把人类历史上所有优秀的和不优秀的东西都一刀砍断。最有代表性的口号就是“横扫一切封、资、修的毒草”，“封、资、修”这三个字实际上概括了人类历史上一切经验和文化。这样的切断把我们彻底地抛到了文化的荒漠中。我们今天的教育就是沿着反“封、资、修”的路子走过来的，尽管在“烧书”这一层面已经大有改观，但教育的观念还是老样子。我们的教材仍然不遗余力地告诉你只有一种东西是正确的，其他的都是错误的，而且用一整套考试制度强制你接受并相信这种东西。学生因此只能拥有最单一的知识、最单一的观念。把受教育者的精神变得非常单一，这实际上就是精神阉割。一个人从走进幼儿园开始就遭受这样无情的阉割，精神生命哪还有发育和发展的余地！我们的精神从一开始就处于这样一种荒芜状态。教育本来应该开发人们的内在潜能，可是我们的教育偏偏从内部窒息了

人们的潜能。

钱理群：教育还有一个功能是启发受教育者进行自我开发。知识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古希腊的命题“认识你自己”，建立一个人学知识结构。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最终还是落到对自我个体生命的认识上来。这两个方面都应注重，不可偏废任何一面。而我们的教育在这两方面都出了大问题。在阉割人类知识上我们走得太远了。即使有极少数知识有幸进入我们的视野，也被我们歪曲得面目全非。比如《项链》，被我们理解为批判资产阶级虚荣心，这就是用意识形态化的讲法来歪曲人家的艺术创造。我们的教育太漠视人类心灵。列宁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是“七分无用三分有用”，这种“用”的观念对我们的教育伤害太大。我们总是错误地认为个人的精神生活是无用的，于是我们的教育无情地压抑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人成为书橱，把人类的心灵变成了某种意识形态观念的“跑马场”。我的讲课总是试图让学生打破时空的界限，和人类历史上的伟人进行精神对话。人打开书就是与遥远时空的人进行精神交流。书本教育的很多好处就是可以打破时空的界限，哪怕现实世界是一片污浊，你都可能通过书本拥有更加浩瀚的时空中的一片光明。高尔基能成为一名巨人，书本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通过读书而进行的交流是很平等的，因为这不是由教育体制背后的强权灌输给我们的。

我们所谈的个体生命指的也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命个体。一方面具体的你我他，另一方面也指向所有的个人，还包含博爱的内容，整个人类的生命都与他有关，甚至扩展到非人类、宇宙存在。建立这样的观念，完全靠书本是不可能的，还得靠作为一种文化行为的教育。要给学生建立这样的观念，一是自我开发，充分表现自己的生命力量；二是为人类服务。二者并不矛盾。为人类服务也包含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而具体到近代以来中国是一个

受压迫的落后国家，还要为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服务。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包含有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的一面。我很赞成蔡元培的观点，要教育学生不要拒绝物质。这方面也有教训，毛泽东要完全把人变成精神的人，出发点本来就不合理，后来当然就要导致荒唐结论和结果。他有一句话是“一个纯粹的人”，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还针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强调人的群体性，企图完全扼杀人的个人性。《纪念白求恩》很重要，是表现毛泽东人学思想的重要文献。他的这种理想讲起来很吸引人，“毫不利己”和“纯粹”，一般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容易接受。而这种纯粹的精神在现实存在中的表现就是“共同理想”，他由此提出要为共产主义这样一种全人类的“共同理想”贡献一切。表面上看这是很美好很纯洁的词汇，但再往下推，为了某个崇高的“共同理想”就可以要求别人牺牲生命，甚至可以强迫你牺牲生命，也就是可以杀人，可以做一切他认为对实现“共同理想”有利的事情，很美好纯洁的东西由此就转化成了很可怕的东西。

摩罗：革命的恐怖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钱理群：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可以做一切事情。这是一个命题，有它的逻辑推理和整套理论。毛泽东还提出“人群是划分为阶级的”，这也是对底层人和知识分子很有诱惑力的一个命题。毛泽东思想有一个特点，每个逻辑前提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他就是这样推理的：在阶级社会里，人群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的利益是由政党的政治理想来代表的、而政党的利益是靠领袖来综合体现的。这样推理下去，为了人的群体利益，每一个个体的人就必须成为党的工具，进而必须成为领袖的工具。毛泽东的命题都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命题，而每一个命题的实践展开和逻辑结果却都是这样可怕。

摩罗：我们这几代人的思想观念，包括现在刚入高校的学

生，就都是按照毛泽东的理念灌输出来的。

钱理群：而且在当代，我们又面临一个物欲横溢的问题，个人欲望的极度膨胀，对毛泽东的理念构成反讽。其实应当把这些问题揭示出来做理论上的清理。只有揭开曾经导致我们民族精神迷乱的这类的“逻辑迷魂阵”，这个民族才可能有理性的追求。要作理论上的清理，当然很不容易，这涉及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等许多方面的问题。

人文教育和技术教育的关系

摩罗：前面所说的这些教育理念落实到中学语文之中，就是过于强调语文教育的工具性。今年第11期《读书》杂志上，葛兆光先生的一篇文章就谈到这个问题。他是通过比较中国和日本的语文考题来阐述这个问题的。他说：“如果说，日本的‘国语’出题者心目中，标准国语是文学散文所表现出来的美文，那么中国的‘语文’出题者心目中，标准语文是社论体或报纸体那种应用性文字。这里的合理性前提是社论或报道等报纸传媒的权威，而报纸的权威来自政治性权威。”这里的工具性有双重体现，第一重是把语文教育的功能理解为为人们提供在一个生活共同体中共同生活的工具，第二重是通过语文教育把人们训练成为特定的政治权力实体的工具。这正是最让人产生疑问的地方。语文教育究竟仅仅只是要解决工具问题，还是同时要解决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比如解决精神问题，个人精神自由问题，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问题。我们是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还是可以二者兼顾？

钱理群：我觉得比较复杂，因为语文界对语文教育的性质历来有争论。一种是“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一种是“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这两个口号由来已久。前者是针对50年

代特别是1958年以后的一种倾向提出的，因为那个时期语文课被变成了一种变相的政治课。于是有人提出语文课是一门工具课，用以抵制语文课政治化的倾向。还有人提出了语文课不是文学课，1956年曾进行过一次教育改革，当时把语文课本改成文学课本，按照文学史的框架选择经典著作。从《诗经》读起，然后是唐诗宋词，还有鲁迅、曹禺、老舍等等。这样上课似乎跟我们现在提的“人文精神”较接近，现在还有人怀念当时的课本。但这种课本有一个毛病，就是对学生进行了纯粹的文学教育，而相对忽略了语言文字的训练。当时的文学课本很大程度上受苏联影响，而苏联是拼音文字，识字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而中国的汉字是很难学的，如果学生没有基本掌握语言文字的能力的话，文学教育也会落空。于是有人出来强调语文课不是文学课。60年代针对这两种倾向提出了“语文课是一门工具课”，强调要抓住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我们今天语文教育的格局就是那时建立起来的。后来语法越来越多地介入进来，现在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尽管最早提出这样的主张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但把语文课定位为工具课的主张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弊端来。这种主张把人文教育排除在语文之外，使语文变成了一门技术性的课程。

但又不能因此否定中小学教育的技术性内容。它是要让学生具备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和阅读写作能力。中学语文教育是有双重性的，既是人文教育，又要对学生进行语言文字能力的训练。它的复杂性还在于汉字难学。另外，中国有两套语言，文言和白话。中小学语文中文言到底占多大的比例？比例占得太小不利于学生掌握文言文，太多了也不合理。大陆教育和台湾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区别。台湾是很注重文言文的，它的许多考题我都不一定能答上来。汉字难学和两套语言的特点决定了中小学语文教育相当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让学生掌握中国语言。我担